

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人的汉语学习

顾 钧

(北京外国语大学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 在 19 世纪 30 年代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 美国商人中只有亨德一个人认真地学习过汉语。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 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 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 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关键词: 汉语学习; 裨治文; 卫三畏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6604 (2012)04 - 0041 - 04

1784 年 8 月 28 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停靠在黄埔港, 中美之间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在此后的 50 多年间, 尽管有不少美国商人和外交官来中国进行贸易和考察, 但愿意认认真真学习汉语的只有亨德(William C. Hunter)一个人。亨德 1824 年被一家美国公司(Thomas A. Smith and Sons Co.)派遣来华, 目的是学习汉语以便服务于该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亨德于 1825 年 2 月 11 日抵达中国, 由于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老师, 很快便离开广州前往新加坡, 希望能进那里的一所学校学习汉语, 但那所学校的情况也不理想, 于是他再次转往马六甲, 进入当地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学习, 直到 1826 年 12 月底。亨德于 1827 年初回到广州, 并很快见到了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24 年离开美国时亨德曾带着一封公司写给马礼逊的介绍信, 但由于马礼逊 1824—1826 年回英国休假(1826 年 9 月返回广州), 亨德直到 1827 年 1 月才得以见到这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如果当初马礼逊没有离开, 亨德也许就不需要舍近求远地远赴马六甲了, 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 20 年(1807 年来华)的马礼逊无疑是最好的汉语老师。两人见面后马礼逊测试了亨德在英华书院一年半的学习成果, 结论是“优良”(good)。在其后给亨德父亲的信件中, 马礼逊报告了这个好结果, 并说亨德在汉语这样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上的进步“不仅是他个

人的荣耀, 也是英华书院的荣耀”^{[1]161}。

马礼逊对亨德的测试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英华书院的教学水平, 因为这所书院正是在他提议下创办的(1818 年), 为此他捐助了 1 000 英镑用于校舍的建设。书院实行中外学生兼收的政策, 既教中国人英文和西学, 也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培训。马礼逊建立这所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培养紧缺的汉语人才。

亨德来到英华书院时, 书院的院长是伦敦会传教士汉弗莱(James Humphreys), 他是第二任院长, 首任院长是协助马礼逊创办学院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在担任院长 4 年后于 1822 年去世。亨德在英华书院的汉语老师柯利(David Collie)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 代表成果有《四书》英译(1828 年)。亨德的另外一位老师是一个广东人(Choo Seen-Sang, 担任柯利的助手), 他不仅熟悉中国经典, 而且能说一口准确流利的官话^{[1]237 - 259}。有这样中外高水平老师的指导, 难怪在不长的时间里亨德的汉语学习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础, 就会发现是来自 1823 年马礼逊访问马六甲时对他的指导, 这样一来, 亨德就应该算是马礼逊的“徒孙”了, 虽然在英华书院一年多的学习成果得到了“师祖”的肯定, 但亨德并不就此满足, 他在广州当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国老师(Le Seen-Sang)继续学习。但不久之后他所供职的公司破产, 于是他不得不中

断学习返回美国。1829年他乘坐新雇主奥立芬(D. W. C. Olyphant)的商船“罗马人号”(Roman)重返广州。在这条船上他结识了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并每天教授裨治文中文。正是从马礼逊的“徒孙”那里,裨治文获得了最初的汉语知识。英、美第一位传教士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有点巧合,但事实本身既说明了马礼逊作为汉语教师的广泛影响,也说明了美国汉语人才的缺乏。从1784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至1792年贸易额仅次于英国),但半个世纪当中能够熟练掌握汉语的美国商人却只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益,一般都来去匆匆,对于那些有机会长期居留的人来说,汉语的复杂难学也使他们或无心问津或裹足不前。美国商人不愿意和不积极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汉语,也非标准的英语,还夹杂着一点葡萄牙语,就是所谓“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它起源于广州人在与英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学习英语的实践(开始于1715年前后),其特点是完全不顾读和写的训练,只关注听和说——把听到的英文单词用汉语记录下声音,再根据汉语注音说出来。这种看似简单易学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注音不准确(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多音节缩减为汉字的单音节)而导致发音走样,二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而使说出来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却不妨碍做生意,甚至是大笔的生意^[2]。

中美直接贸易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786年向广州派驻了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后他的职位由斯诺(Samuel Snow)接替,斯诺1804年底离职后由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年),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 C. Wilcock)接任。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3][63]}。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1844年当顾圣(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 B.

Reed,1857—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 M. 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先生。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4][274]}。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勋爵率团访问北京,翻译工作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到了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主要的翻译一个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一个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因为掌握汉语知识后就能够为基督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下定决心,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将竭尽全力,即使进步缓慢也不灰心沮丧。”^{[5][103]}米怜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其他来华传教士的心声。

1829年裨治文来华时,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给他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6][22]}。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1833年另一位美部会传教

士卫三畏(S. W. Williams)到达广州后,也就順理成章地把裨治文当作了自己的汉语启蒙老师。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都精神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美部会的指示中担心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应该就是指此而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变,中美《望厦条约》中约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7]36}。裨治文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的主要翻译,其时他已经来华10多年,但据中方人员的看法,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8]3-4}。1844年是马礼逊去世10周年,这位最早的汉语教师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计去世前几年能够用来指导裨治文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来裨治文主要是通过马礼逊编写的工具书来学习汉语,口语不佳也很难求全责备了。经过多年学习,裨治文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长足进步,1836年他用中文独立撰写了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就是明证。卫三畏在回顾条约签订前的中外交往时,特别强调了掌握汉语的重要性,他说:“无论是商人、旅行者、语言学者,还是传教士,都应该学习汉语,如果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必须来中国的话。说以下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冒昧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掌握了汉语,就可以避免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恶感,也同样可以避免在广州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轻视,以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双方交流的备受限制,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汉语的无知”^{[9]500}。

对于学习一门语言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而有限的几种教材皆是欧洲人的作品。为此裨治文和卫三畏在19世纪40年代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的选 择范围,而且也打破了

欧洲人的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①首先于1841年出版(印量为800册),这是美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本专门用于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于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裨治文之所以要编写《广东方言读本》,是因为想学广东方言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但自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1828年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工具书出版,对这一方言的忽视显然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外交流”^②。正如书名所标志的那样,该书以简易语句的形式提供练习,每页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罗马字母拼音,并附注解。全书共分17篇,分别是:(1) 习唐话;(2) 身体;(3) 亲谊;(4) 人品;(5) 日用;(6) 贸易;(7) 工艺;(8) 工匠务;(9) 耕农;(10) 六艺;(11) 数学;(12) 地理志;(13) 石论;(14) 草木;(15) 生物;(16) 医学;(17) 王制。可见作者的意图不仅在帮助读者学习广东口语,也在帮助他们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英汉字典,第二部分是汉英字典,第三部分是汉语词组和句子,汉英对照。《广东方言读本》可以说是对第三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更为丰富和精当,注释的加入也是特色之一。《广东方言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是大8开本、693页的部头使这本工具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简单实用的《拾级大成》(8开本、287页)的适时出版满足了需要。

《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③是卫三畏独立编写的第一部汉语工具书。在此之前他参与了《广东方言读本》的编写。在《拾级大成》“前言”中卫三畏说:“本书是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编写的,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在中国

^① 该书没有固定的中文译名,日本学者曾使用《广东语模范文章注释》、《广东语句选》等译名,详见 Shen Guowei, “The Creation of Technical Terms i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ckner, Michael, et al. eds.,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1), p. 289。

^② Bridgman, “Introductio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p. i.

^③ 该书中文书名页的内容是:“咪喇坚卫三畏鉴定,《拾级大成》,香山书院梓行,道光辛丑年镌”。印刷量为700册。

的外国人,也包括还在本国或正在来中国途中的外国人。”全书的内容如下:(1) 部首;(2) 字根;(3) 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4) 阅读练习;(5) 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6) 阅读文选;(7) 量词;(8) 汉译英练习;(9) 英译汉练习;(10) 阅读和翻译练习。相对于《广东方言读本》偏重于说的练习,《拾级大成》更侧重读、译的练习,显然是为了和《读本》互补。在阅读练习中,作者的编排是先给出中文,然后是拼音,然后是逐字的英译,最后是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阅读练习遵循由易而难,逐级提升的编写原则,先是单句练习,然后逐渐过渡到成段的文字。翻译练习的安排也是如此,从字句的翻译到成段的翻译,从提供参考译文到最后不再提供参考译文,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比较快地掌握汉语。如果像卫三畏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学习者通过前面的操练最终能够完成书末成段的中译英练习(选自《聊斋》、《子不语》、《玉娇梨》、《圣谕广训》、《劝世良言》),那么他确实可以说已经“大成”了。

在《拾级大成》出版两年后,卫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书《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①。这是一部英汉词汇手册,按照英语字母顺序依次列出单词和词组,并给出中文的解释和官话注音。之所以用官话注音,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已经逐渐开放的形势。由于广东、福建仍然是当时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所以在书后的索引中,除了官话注音,卫三畏还给出了该词汇表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按照214部首排列)的广州话和厦门话注音。《英华韵府历阶》可以看作是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

汇》第一部分——英汉字典——的扩大和补充。马礼逊的词汇手册出版于1828年,早已绝版,鉴于这一情况,卫三畏编写了这本工具书。

以上三本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和研究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Hunter, W. C. *Bits of Old China*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1.
- [2] Williams, S. W.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J]. *Chinese Repository*, 1835 – 1836(4):429 – 433.
- [3] Dennett, 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 1941.
- [4] Williams, F. W.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8.
- [5] William, M.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 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 [6] Bridgman, E. J. G.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M].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1864.
- [7] 梁为楫,郑则民.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 [M]. 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3.
- [8] 文 庆,等.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M]. 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
- [9] Williams, S. W. *The Middle Kingdom* [M].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8.

(责任编辑 潘亚莉)

The Americans' Learning of Chinese before the Opium War

Gu Jun

(Center of Overseas Sinologic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in 1830s, only W. C. Hunter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had learned Chinese seriously. After 1840, the missionaries Elijah Coleman Brideman and Samuel Wells Williams compiled three dictionaries, signaling that Americans' learning Chinese had embarked on a mature and smooth way.

Key words: learning Chinese; Elijah Coleman Brideman; Samuel Wells Williams

^①该书中文书名页内容如下:“卫三畏鉴定,《英华韵府历阶》,香山书院梓行,道光癸卯年镌”。印刷量为800册。